

"GE MING YU AI QING" DE XIAN DAI XING XU SHI TU JING

● 林华瑜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革命与爱情」的

现代性叙事图景

——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

"GE MING YU AI QING" DE XIAN DAI XING XU SHI TU JING

ISBN 978-7-216-05857-5



9 787216 058575 >

定价: 32.00 元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

湖北警官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林华瑜 著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林华瑜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7 -216 -05857 -5

I. 革…

II. 林…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426 号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

林华瑜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49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0
插页:1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7 -216 -05857 -5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内容摘要

“革命与爱情”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仅具有一般题材学的意义。本书以“现代性”为价值视点,考察现代小说中“革命与爱情”这一叙事形态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段里大量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解读,本书一方面展示现代作家的心路历程与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也对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文学等系列关系作出新的思考。在论述这个“现代性变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革命与爱情”叙事以对政治现代性激进追求为初衷,在发展过程中这一叙事模式经历了多元变迁,对现代性的诉求也因革命理性主导而步入审美迷途。在 20 世纪后叶的新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这一叙事模式经历了消费文化的喜剧改写和知识精英的后现代颠覆,最终由审美现代性构成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反讽。

本书共分 12 章,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一、二、三、四章)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追寻现代“革命”与“爱情”话语的根源。这部分认为,19 世纪后半叶的“革命”与“爱情”话语主要来源于西方,在与中国本土语境产生化合后,其“现代性”中含有革命“激进化”和爱情“道德化”的负性因子。其二是分析革命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指出它的精神与美学内容一方面承续有五卅的“现代性”,同时也含有现代性的分裂因素,革命化的自我成长压倒了个体的启蒙成长。

第二部分(五、六、七章)主要探讨“革命与爱情”题材叙事在发展过程中的多元风貌。这种叙事的“多元化”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矛盾的以爱欲写“革命”以及通过摈弃“爱欲”来化解“革命化”的矛盾;二是现代通俗类作家在此题材上的迷失、转向与成就;三是在“救亡”革命下现代作家的“爱情”叙事选择。通过分析梳理这些“多元”叙事,作者既勾勒出“革命与爱情”叙事的一段发展历程,也指明此类叙事曾在文学史上获取的现代性实绩,同时也更好地理解现代作家在一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选择。

第三部分(八、九、十章)主要论述“革命与爱情”叙事由现代性的整合到走向现代性的迷误历程。本书认为这类叙事现代性的渐失既受解放区文学理念的规范作用,也与知识者的自我“革命化”相关,随着阶级斗争成为“一体化革命”,意识形态、作家和读者共同加入“革命”的众声合唱,“爱情”被指认为“小资产阶级感情”,这样,“百花时代”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的“现代性”挣扎,“革命与爱情”叙事只能在“为革命作证”中走向现代性的逃避与迷失。

第四部分(十一、十二章)主要论述后新时期的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受消费文化影响,革命与爱情叙事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红色经典”中大量再现,但在革命的幕布下,革命者的爱情和性被演绎成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喜剧场景,革命与爱情话语除了愈来愈商业化的模拟式嬉戏外,已不再具深刻的历史内涵;另一种是以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为代表,作品在狂欢化的话语层面上完成了性对政治权力话语的本质性解构,彻底颠覆了“革命与爱情”所建构的叙事伦理模式。但对于这一主题的现代性建构仍然有待完成。

附录部分收录有作者近年来有关文艺现代性的研究论文十余篇。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现代性的内涵	1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6
三、“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蕴义及其研究价值	10
第二章 “革命与爱情”的叙事话语之源	18
一、现代文学的革命化转向	18
二、现代爱情叙事的萌生	24
第三章 “革命加恋爱”小说——革命文学的原生态 ...	30
一、五四文化精神的“革命”与“浪漫”	30
二、普罗文学思潮的影响	34
三、现代性的美学因子	39
第四章 在革命和爱情中成长——叙事的现代性 分裂	47
一、在革命与爱情的交互中成长	47

2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二、叙事的现代性分裂·····	56
第五章 革命叙事话语中的爱欲规训·····	62
一、女性意识融入革命叙事·····	62
二、《蚀》与《虹》中的革命与爱欲·····	66
第六章 栖息在通俗与先锋之间·····	75
一、“新感觉”的革命与情欲·····	76
二、通俗写作的现代转向·····	80
三、现代主义的新浪漫派·····	83
第七章 “救亡”革命下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89
一、沦陷地的歌哭·····	91
二、新女性的追求·····	94
三、现代性自我的强力喷薄·····	98
第八章 翻身革命中的新人爱情·····	104
一、外来者的步步后撤——以丁玲为例·····	105
二、本土作家的文化选择·····	113
第九章 萧条年代的点点“红豆”·····	117
一、“爱情”话语的压抑摧折·····	117
二、“春天”里的感伤与追悔·····	122

第十章 革命“艳阳”里的现代性迷遁	128
一、革命英雄的“战斗的青春”	128
二、知识者的“青春之歌”	134
三、“艳阳天”里的现代性迷遁	140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时代的“革命与爱情” ——从消费主义到解构主义	149
一、文化语境的现代性变迁	149
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消费性言说	154
三、红色经典的解构性改写	160
第十二章 坚硬如水——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的 空置	167
一、叙事模式的回归与变异：革命与情欲的极致张扬	168
二、解构叙事下的现代性反思	172
三、语言狂欢下现代性建构的空置	176
附录 现代性视阈下的文学研究	181
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183
新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190
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从《铸剑》和《鲜血梅花》看 两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品格与主体精神	194
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	205
权力场上的人性角逐——论刘震云早期中篇系列小说	216

4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公安文艺的现代性思考·····	226
多重对视中的一声叹息——解读徐坤《一个老外在中国》···	237
英雄的悲剧，戏仿的经典——网络小说《悟空传》的深度 解读·····	245
历史感、人道精神与中国作派——评电视连续剧《金婚》···	255
性别权力的两种演绎——《紫色》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的两性文化观念比较·····	261
艺术现代性的双重消解——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 反讽策略谈起·····	270
信息时代文学传统范式的变异与回归·····	280
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学术研究·····	291
结语·····	296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1

第一章 绪论

历史已进入 21 世纪,与上一个世纪相比,新的世纪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远远超出了上一个世纪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马克思对于现代的描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在这样一个变革极为迅速的年代,重新以“冷静的眼光”审视过去的文学和精神现象,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时间所具有的永恒“流动性”不时地提醒我们,过往的历史与当下和未来系于一体,命悬一线。如何理解历史也即如何理解我们自身,反之亦然。在这个回溯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命题自然呈现。

一、现代性的内涵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现代性”逐渐成为中国文学阐释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关键词。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对“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梳理和阐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多角度地、同时也更具深度地理解,找到了一个具有聚合功能的阐释平台。即使当今众多“后现代”论者在大量言说“反现代性”的同时,也一再返回对“现代性”本身的重新理解。^①

从语义上看,所谓“现代”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的一个时间性范畴,通常指欧洲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时段。鲍曼指出:“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②但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观念不仅仅指代一种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分期,它在本质上意味着自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在社会制度、认知和心性等三大领域中的彻底决裂和更新,尤其是17到18世纪西方发生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从形态面观之,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③

由于这一转型的发生,理性和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价值核心。理性是启蒙运动用以替代上帝,作为价值之源与对现存事物

① 刘小枫认为,“后现代”论述一开始就面临双重尴尬。现代性论述的文献已表明,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也是基本的“后现代”论题,仍为百年来的“旧”话新语,以致“后现代”论述的“主义”论证显得颇为费力;更为尴尬的是,“现代性”本身尚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当“后现代”论述仍然要以“现代性”知识学来界定自身时,发现关于“现代性”的知识学尚在飘浮之中。“后现代”论述对现代性论述的攻击,实际成了现代性论述的一个激进的变种。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p. 4.

③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批判的标准,是人们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早在西方古希腊哲学那里,“逻各斯”、“理念”等概念即已体现了理性的精神。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更是以“我思故我在”的理性自我意识作为其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人性复归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文艺复兴运动重新肯定了人们对世俗爱情、感性幸福的追求。在高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潮激荡下,西方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由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向无神论的转变,由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这一过程即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过程。在韦伯看来,由世俗化追求与理性主义主导的宗教批判,导致了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伴随着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而产生的,是对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诸种权利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社会与国家的组织原则与形式的重新厘定。启蒙哲学高举“理性”大旗,否定了造成世间迷信与蒙昧之根源的“神”,使现代社会成为“属人”的社会。人的主体性的自我确证(the self-reassurance of subjectivity)被哈贝马斯确认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因之,现代性也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美学家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归根溯源是一种时间和历史意识,一种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①西方中世纪的时间,本质上是按神学思想来理解的。启蒙运动以后,人们逐渐树立了一种前进的时间观念,以为历史有自己发展的轨迹,不断向

^①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24~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种观念和思维模式中,人们打破了神学的控制和压抑,摧毁了旧的价值观念,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和对理性的推崇。人从神的阴影下走了出来,自觉追求个体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在文化领域,主体性的确立也使得文化从神性而通向世俗性,通往人自身。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在社会上的确立,使得社会组织化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现代科学、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不同知识模式也因此得以分化和独立。

作为一个单纯的社会历史进程,“现代性”从它登场的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南京大学周宪教授采取两种思路来分析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第一种方法是历时方法,即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有前后不同阶段并显出不同特征的历史过程。第二种方法则是共时方法,即在逻辑的层面上来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从历史(历时)的方法出发,现代性可以区分为前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从逻辑方法出发,现代性又可以区分为社会现代化(性)和文化现代性。如此一来,不同时段与不同层面的现代性就呈现出“异相”,各自处于一种对抗的紧张状态。

前期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为主要内容。启蒙现代性呼唤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科学和理性原则。宗教-形而上学的统一让位于理性的统一。后期现代性则是对前期现代性的反思。按照美国哲学家卡弘的研究,在前期现代性中,文化具有一种调节主体一对象、外在一内在、精神一物质的机能。也就是说文化在前期现代性中与社会总体趋向大体上保持一致,并起到某种协调作用。而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的扩张消解了文化的这种协调机能,文化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其典型形态便是现代主义文化。^①早期现代性中也存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在总体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统一和协调还是主流。而到了后期现代

^①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载《文学评论》,1999(1)。

性阶段,对前期现代性的否定声音终于扩大到产生了一种对抗性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的某些弊端被暴露出来。理性原则被片面地强调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大机器工业虽然带来征服自然的力量,却也使人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曾经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技术和理性,转而成为一种压抑人的自由和感性的异化力量。按理性原则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在带来社会的高效率的同时,也成为控制和监视人的一种巨大的异己力量。当代社会的商品生产渗透到文化艺术中,大规模的机械复制使得艺术品日益成为消费品。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重新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检视。

从共时维度来看,可以将现代性看成是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矛盾。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两种现代性的对立问题,他认为西方 19 世纪以来导致先锋派产生的审美现代性,与作为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全面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的社会现代性产生了无法弥和的分裂。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对理性压抑人的个体自由进行反抗。这种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代表就是浪漫派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无论从哪个维度看,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对立都十分明显。现代性过程和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相伴相生的。现代主义对非理性的张扬、对工具理性的唾弃,对乐观的人道主义的反思都是这种现代性复杂面目的显现。而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与现代性既联系又分裂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掀起了对现代性的颠覆性批判。

从当代世界的现代发展史看,现代性确实带动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变革,这些变革是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在社会各个层面中得到确立的突出表现。从经济方面看,现代社会生产的核心由农业转向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空前增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商业和工业资本在经

济中起决定作用；从社会政治方面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体，国家内部社会生活管理民主化，公民的政治和公共空间扩大；从文化方面看，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个性化进程加快，各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削弱，独立的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等门类按自身的原则建立起来，教育普及，大众文化出现并且影响日益扩大。这种起源于西方的一整套社会模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推向了世界，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统一的“现代性”的世界历史。

现代化进程从西方国家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它使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史。西方现代化国家最早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性因素，因之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而大部分东方国家现代性转型时间较西方要晚，并且多由外部力量催生而成，因之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毫无疑问，中国从晚清起就被卷入这一进程，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在被卷入现代性的统一世界史过程中，中国文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封闭独立的发展走向拥有世界文学视阈的开放式。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它登场的一开始也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它不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注重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置疑，而是自始至终致力于中国社会及国人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建构。19世纪中叶以降大清帝国的国门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被迫打开，中国文化进入了启蒙觉悟时期，有识之士深感必须变革从器物到制度乃至文化的古老传统，以求国家与人民的自强自新。这一过程充满了阵痛，但就总体文化目标来说，这是在背

负深重的中国传统基础上,与西方前期启蒙现代性呈现出共相特点,即以张扬民族独立意识,呼唤人的主体地位,确立科学和理性原则为目标。

笔者曾在《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一文中提出以下观点:现代文学是中国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在文学领域的体现,或者说,当国人获得了现代文化意识之时,作为抒写心志的文学也随之具备了“现代性”的因子,尽管它一开始可能是浅露的甚至是潜隐的,但这已经是文学史长河中的新质,并不妨碍现代文学史的到来,这就像理解一条河流的发源一样,它的源头并不在水势开阔处,往往冰山之巅的涓涓细流才是它的正本清源。^①在1840年后的中国,民族的独立意识与自强意识其实已经具有了现代意味,因为它已超出了先前的满汉之争,而是在一种全新的世界国家政治格局中进行的,及至今天它的一些主题仍未过时。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次年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一次的失败使全民族真正警醒过来,原来古老的中央帝国不仅打不过英、法等欧洲列强,就连向来被国人视为藩属的区区岛国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这次巨变使文人开始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进行反思,一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一种“应变哲学”,要实现民族的真正强大必须实行体制上的与西方接轨。甲午战争次年,梁康等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名“公车上书”,请求变法。虽然他们所要求的是在皇权下进行改良,但这是一次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良,而是致力于引进西方体制,强大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发生在封建政治环境下的带有革命性质的要求和呼声,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这种要求和呼声的实践。这表明甲午战争以后,现代文化意识不再是以前只有先觉者才具有的星星之火,尽管还不能成为燎

^① 林华瑜:《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载《青海社会科学》,2002(4)。